

# 传统中的动力

## ——中国早期现代化动力研究之一

周积明

**〔内容提要〕**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作用错综复杂。作为生长于农业——宗法社会之中并适应这一社会运行机制的文化体系,它以强大的保守性和坚固性抵抗现代化变革,但它内部所包含的诸多成分,却又同时成为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动力。中国最初的现代化精英,正是在传统忧患意识、变易观念、自强观念、经世观念的作用下,投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变革,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有关现代化进程的任何讨论不能不涉及现代化的动力问题,中外现代化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已有卓越的理论贡献。事实上,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往往绾结动力与阻力于一体,在历史深处同时发挥推动现代化与阻滞现代化的双重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注定影响现代化面貌和速率的文化传统。早期“现代化理论”曾经建立“传统——现代”的两分法构架并确信现代化进程与摧毁传统实际上是同一过程,这一观点长期影响人们以一种激进主义的方式看待传统与抗拒传统。艾森斯塔特于70年代提出与“现代化理论”相悖的观点,其依据在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日益丰富地展示出传统与现代化相契合的一面:

第一,有许多资料表明,传统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如家庭、社区,甚至包括政治制度)的瓦解,所导致的往往不是现代化,而是解组、断裂和混乱,此种情形不利于有生命力的现代秩序的建立。

第二,在英国、日本和埃塞俄比亚等

国家,现代化是在传统象征的庇护和传统精英的赞同下取得成功的。

第三,在有些社会中,现代化的最初动力来自于那些反传统的社会精英,但在现代化启动后不久,他们又将传统社会中的某些成分或象征恢复起来,尽管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非十分情愿并犹豫不决。

艾森斯塔特由此结论说,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因素,现代性实际上是从传统中发展起来。

艾森斯塔特的见解启发人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传统与现代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从中耐心剥绎传统中哪些因素有助于或有碍于现代化变迁。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以三种形态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发生深刻的联系:一、直接支援;二、间接结合;三、阻碍现代化变迁。三种形态的错杂和碰撞,既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的山重水复,又体现了中国早期

现代化进程充满了复杂性和艰巨性。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直接支援现代化变革的诸因素,它们是忧患意识、变易主义以及“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

## 一、忧患意识的新功能

中国文化素有忧患传统。《易·系辞下》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尚书·君牙》云:“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水。”《礼记·儒行》云:“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中国传统忧患意识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即不是强调走向自我的忧患,而是强调由自我走向社会的忧患。因此,它在精神的层面上展示忧国忧民的宏大抱负,在思想认识层面上展示居安思危的警世意向与深刻揭示现实危机的洞察力。从殷周之际周公、召公的“无疆之恤”到清乾隆时黄景仁的忧郁之吟。<sup>[1]</sup>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挫而复起、穷且弥坚的精神动力所在。当世界现代化进程向古老的中华帝国提出尖锐挑战时,忧患意识的积极意义再次显现。

忧患意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正面效应最初可见于陶澍、林则徐与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朝野上下如痴如梦、沉醉于“海内清宴”的氛围中,忧患意识推动他们以敏锐的觉察力,洞见潜在危机,“思患而豫防之”。<sup>[2]</sup>有关文献揭示他们文化行为的思想动因说:

当道光之中,承乾隆之后,西域府定,海宇宴然,……而文忠与文毅独于宴安无事、局守文法之时,洞见病痕,亟起救药。<sup>[3]</sup>

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sup>[4]</sup>

忧患推动陶、林联手,改革乾隆朝以来的若干政经体制,从而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了某种契机;忧患也推动龚自珍于黑暗混沌中发出危机预言,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最初一页。

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对于外来现代化挑战的回应,也渗透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巨子魏源向国人揭示忧患激活思想觉醒的命意说:

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sup>[5]</sup>

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sup>[6]</sup>

正是因为深切忧患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魏源、徐继畲、郭嵩焘以及那一时代的先进中国人,毅然走出中古思想学术的篱藩,<sup>[7]</sup>表现出改革旧物与融摄异质文化的最初意识。尽管他们的著作和言论在今天的学人看来浅近而不足道,但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关口有着别开一种心路的历史价值。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批领导力量——洋务派亦是在民族忧患中走上历史舞台。曾国藩“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sup>[8]</sup>惶遽忧惕之情中渗透着啃心噬肺之痛;李鸿章发现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所处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者则事不可知”。<sup>[9]</sup>其危机感也急促紧迫。纵观洋务大吏和洋务思想家的言论,忧患之思皆占有凝重分量,而这一心事正是他们文化行为的重要起点。

20世纪初年登场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同样郁积对民族危亡的深沉忧患。康有为一再述说他“闭户常忧天下事”、“忧患弥天塞太空”的沉郁心情。<sup>[10]</sup>谭嗣同“当愤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傍徨,未知所出。

既忧性分中之民物,复念灾患来于切肤虽躁心久定,而幽怀转结。”<sup>[11]</sup>孙中山忧患“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sup>[12]</sup>陈天华忧患“中国人好像死人一般”,对于迫在眉睫的瓜分之祸“分毫不知”。他们忧患的方面虽各有侧重,其间的相通性却显然可见。

中国近代文化精英忧患意识的深沉郁结,无疑以现实危机的强烈刺激为原生动力,脉流久远的忧患传统则在其中起有一种浸润与激励的作用。故魏源读《诗经》“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读《周易》“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sup>[13]</sup>康有为“每读杜陵诗,感慨更摩挲。上念君国危,下忧黎元疴。中间痛身世,慷慨伤磋跎”。<sup>[14]</sup>传统的激发与现实的感触相交织,显示出历史与现实之间无法割断的脉脉联系。

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精神生命中的极可贵情感,更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强韧的基因。中国近代弥漫于文化精英中的忧患意识,一方面升华人们的精神境界,“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sup>[15]</sup>另一方面推动人们走向以“自强”为目标的现代性变革。李鸿章曾谈及洋务派由忧患走向“自强运动”的基本思路说:

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sup>[16]</sup>

事实上,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每一环节都离不开忧患意识的驱动,正是因为现实的忧患与忧患的传统相聚合,方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而传统忧患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转型,成为中国防御现代化思想与近代民族救亡思想中的有机成份。

## 二、变易主义的新功能

现代化的本质是对传统的革命,变革意识理所当然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基本思想驱动力。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与向前延展的进程中,这样一种思想资源无疑并不缺乏。

在中国古代思想库中,“变革”的观念从来就是一个极富生命力的重要命题。位居“六经之首”的《周易》对变化之道有深刻、系统的阐述,作者以睿智的眼光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常则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sup>[17]</sup>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sup>[18]</sup>

诚然,《周易》也谈阴阳和“天尊地卑”,也有注重秩序的“不易”观念。<sup>[19]</sup>但是,它的精神主线是重刚、行健和主动,它所给出的宇宙图式“刚柔相摩,八卦相荡”,<sup>[20]</sup>充满运动和变易的张力。在二千余年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周易》的“通权”、“变易”思想,构成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原动力,也成为历代社会改革家推动社会变革,创新思想家倡导观念转变的依据。

中国近代最先锐气呐喊变革的是龚、魏两位思想巨人,其思想旨趣与《周易》的变易哲学一脉相通。龚自珍叙说自己的思想基础说:“自珍少读历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sup>[21]</sup>正是本着“变易”的历史观念,龚自珍痛斥“拘一祖之法”,“束之于不可破之例”的守旧意识,大声疾呼:“法改胡所弊?”,“奈之何不思更法?”<sup>[22]</sup>“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sup>[23]</sup>虽然,龚自珍的变革方案,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只不过是“药方只

贩古时丹”。但他急迫的更法变制的呼喊，揭开了近代史上带有时代使命的思想启蒙序幕。

与龚自珍比较，魏源的变易思想更为系统、完善并更具理论色彩。魏源竖观历史，指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二代以上，天皆不同于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sup>[24]</sup>，而这种变化的总趋势是“变古愈尽，便民愈甚”<sup>[25]</sup>，“后世之事胜于三代”<sup>[26]</sup>。即使“（伏）羲、（帝）复生”，孔子在世，也只能顺应历史变革的“大势所趋”，“不能不听其自变”<sup>[27]</sup>。为此，魏源大声疾呼：

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sup>[28]</sup>

虽然，魏源的诸多变革论是对19世纪外来现代性挑战的回应，但其思想基础与理论基础却仍然必须追溯于中国传统变易观念。

多由洋务派大吏幕僚出身的洋务思想家是“变易”说的积极鼓吹者。冯桂芬的《校庐抗议》便深刻贯穿了“究变变通，此其时矣”<sup>[29]</sup>的变易思想。他在《收贫民议》中指出：“古今异时亦异势。”因而，“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一思想正是洋务运动藉以展开的重要思想依据。与冯桂芬相应合，王韬著《变法》一文，开篇即引用《周易》的“穷变通久”说。郑观应论证变革，也广为援引《周易》有关“变易”的理论以及《中庸》的“时中”说与《孟子》的“圣之时者”说。<sup>[30]</sup>他鲜明地提出，“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sup>[31]</sup>薛福成亦大声呼吁：“大抵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自尧舜至今世益远，变益远。”<sup>[32]</sup>据统计，

王韬、薛福成和郑观应三人生平言及变局之处，不下十次之多。

作为洋务派另一翼的洋务大吏，也大力张扬因时变通的观念。曾国藩于咸丰元年论及“经济之学”的路数，主张“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变通的学术意识，实际上潜藏着后来从事洋务活动的思想因子。洋务运行的中枢人物李鸿章也屡屡申述“变易之道”。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海防讨论中，他引述《易经》关于“变通”的理论，分析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指出“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只有“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sup>[33]</sup>，才是唯一出路。李鸿章所谓的“不可泥成格”，“不可不开风气”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谈变易，而是欲以西方的现代文明变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格局。他在一封书信中说：

不得已舍陆登舟，用夷变夏，……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sup>[34]</sup>

对于传统儒学“用夏变夷”的文化中心主义来说，李鸿章的言论，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突破，而这一突破的理论基础便是《周易》曾系统阐发的因时变通之说。

洋务派的殿军张之洞对于变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亦有论述。他在《劝学篇》中，将“知变”作为“五知”之一，同时强调“不变其习不能变其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专己袭常，不能自存”。他又从弥久弥香的儒家经典中搬来依据：

交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

也;温故知新,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sup>[35]</sup>

他的言论,勾勒了传统“变易主义”的大致轮廓,也昭示了洋务派变易思想的传统源头。

洋务派谈变易,往往同时强调天地万物、社会秩序“不变”的另一面,郑观应便声言:

中,体也,所以不易也,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所谓变易也,圣之权也。<sup>[36]</sup>

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可变者富强之术,非孔孟之常经也。<sup>[37]</sup>

张之洞也一再申明:

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机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sup>[38]</sup>

这种“不变”的观念亦同样出自《周易》<sup>[39]</sup>变与不变的双重理论,因此构成洋务派变易观的重要特点。

继洋务派而起的维新派在变易问题上有更为丰富的理论阐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七上皇帝书以及戊戌奏稿;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和其他文章,均是那一时期维新派论变的代表作。

维新派论变,同样本于传统“变易主义”。康有为说:

变者,天道也。……传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系易,以变易为义。又曰:“时为义大”。时者,寒暑裘葛,后

天而奉天时,此先圣大声疾呼,以仁后王者耶?<sup>[40]</sup>

他又向光绪帝进言说:朝廷大政,必须“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sup>[41]</sup>这些倡变的言论既是借助历史论证现实,又足以显示维新派“变易”思想的源泉所在。

和洋务派以及以前的龚魏比较,维新派的变易观有引人注目的进展。第一,不仅强调“变亦变,不变亦变”,<sup>[42]</sup>而且主张“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sup>[43]</sup>从而划开了维新运动与小变、局部变的洋务运动之间的历史界限。第二,发挥《礼记·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思想的精义,强调“革去故、鼎取新”并举,<sup>[44]</sup>“除旧与布新”“用力相等”,<sup>[45]</sup>由此形成与布新而不除旧的洋务运动的不同变革格局;第三,将西方进化论与变易的论说结合起来,<sup>[46]</sup>传统变易主义因此获得全新的意义,外来的进化论亦由此取得中国化的形式。

从维新派的“日日为新”更往前推进一步,便是革命派力倡“革命”。“革命”一词,源头有二,一来自西方,二源于《周易》。《周易》中所说“革命”,其核心意蕴是变易受困的逻辑结果:“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sup>[47]</sup>经过革命解困后,历史才能继续发展。故《易·杂卦》释“革”为“去故”,为“改变之名”。《易·卦辞》更申述变革与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说:“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些经典性的概说,不仅对孙中山等革命派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是有力的理论支援,而且成为国人认同革命、参与革命的重要的心理基础。

从龚、魏到孙中山,《周易》以来“穷变通久”的思想传统构成近代中国人回应历

史变局与投身现代化变革的哲学基础和  
心理基础,在早期现代化的本土思想资源  
中,其地位与意义均不可低估。

### 三、实学传统的新功能

中国古代素有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  
其基本特征是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在传  
统社会的兴衰更迭过程中,经世致用是统  
治阶层应付困境、解脱危机的基本手段,  
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  
过程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亦张扬积极  
作用。

追索实学传统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  
关联,现代化精英的学脉是一条重要线  
索。从道咸到同光,学术界固然汨汨流动  
多样思潮,其荦荦大者却无疑是传统经世  
实学。

最先可谈的是嘉道暨道咸间的龚(自  
珍)、魏(源)、林(则徐)、陶(澍)、徐(继  
)、姚(莹)等人,他们既是中国早期现代  
化的思想先驱,也同时是传统经世实学在  
近代的复兴者。龚、魏二人是以经世实学  
扭转“浮藻”学风的领袖人物,同时代人  
与后来者评价他们在近代经世实学上  
的历史功绩说:

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  
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  
开之。<sup>[48]</sup>

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  
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  
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皆魏氏倡导  
之,或光大之。<sup>[49]</sup>

林、陶、徐、姚的基本性格也是经世务实  
史称:林则徐“究心经世学”,“以经世自  
励”;<sup>[50]</sup>陶澍“少负经世志”,<sup>[51]</sup>“以学问为  
实行”;<sup>[52]</sup>徐继“读书志经世,于部曹事  
例,郡国利病,无不穷研”;<sup>[53]</sup>姚莹“弱冠时

即以经世自任”<sup>[54]</sup>，“意济世利人”。<sup>[55]</sup>龚、  
魏、林、陶、徐、姚等人几近一致的思想进  
路与务实的学术政治风格,有力地影响了  
道咸年间的学术思潮,中国近代第一代实  
学群体亦以他们为主体蔚然形成。

继道咸经世派而起的洋务派是一个  
十分复杂的群体,其中既有执掌中央枢要  
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宦僚如奕、文祥、曾  
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又包括  
马建忠、王韬、容闳、薛福成这样一批“洋  
务新政”的谋划者和鼓吹者,郑观应、唐廷  
枢等洋务企业家和经营者,李善兰、华衡  
芳、徐寿等工程技术人员亦属于洋务派这  
一范畴。然而,无论洋务派成员个人的经  
历、地位、个性、智力乃至生活方式是如何  
相似或不相似,他们的思想根株都与经世  
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洋务运动的先导曾国藩自青年时代  
起,就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sup>[56]</sup>他  
最为重视的经世学者有二人,一是王夫  
之,一是魏源。他多番研读王夫之的《读通  
鉴论》和《宋论》,从王夫之关于治国行政、  
制夷平乱、练兵用将、树人立法、兴学育  
人、钱粮盐铁等有关军国大计、经世大略  
的宏论中充分汲取营养。正是在曾氏兄弟  
的全力支持和亲自参予下,《船山遗书》得  
以大规模刊刻,传遍海内。对于魏源的经  
世著作,曾国藩亦十分关注,其家书和日  
记中留下了他读魏源著作的记载:“七月初  
九彭山峒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  
世文编》一部”<sup>[57]</sup>《圣武记》又阅一编毕,  
昔年在京阅过”<sup>[57]</sup>“经济之学,吾之从事  
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  
编》”<sup>[59]</sup>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专折  
奏请以魏源入祀江南名宦祠,可见他对魏  
源的由衷尊重。王夫之、魏源都是湖湘文  
化中经世学风的代表性人物,曾国藩正  
是在继承他们的思想基础上,走向波澜壮阔  
的洋务大潮。

曾国藩对经世派前贤更多的是精神

上的追慕,左宗棠却有幸与道咸间湖南著名的经世人物发生多方面的亲缘联系。他于道光十年(1830年)结识贺长龄,贺长龄对他深为赞许,称他为国士,并悉发所藏官私图史,供左宗棠阅读。次年,他求学城南书院,主讲城南书院的贺熙龄以“义理经世之学”相指导,并将小儿女嫁给左宗棠长子。道光十七年(1837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籍省墓,路过醴陵,醴陵知县延请当时主讲醴陵淶江书院的左宗棠为陶澍下榻的馆舍拟楹联。素来敬仰陶澍的左宗棠奋其才学,拟出楹联如下: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澍激赏此联,延请相见,“纵论古今”,“顺谈竟夕,与订交而别”。<sup>[60]</sup>陶澍病卒后,贺熙龄荐左宗棠去陶家当塾师,并促成宗棠长女嫁给陶澍之子陶杲。正是在陶家,左宗棠读遍陶澍藏书。他在家书中十分兴奋地说:“吾在此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sup>[61]</sup>三次会试不中后,左宗棠更专心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他在致陶杲的信中说:“山居无事,正好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sup>[62]</sup>由于左宗棠40岁以前在“有用之学”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初出山即表现出娴熟的经世才干。“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sup>[63]</sup>以后更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其“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历古以来,书生戎马……未有如宗棠者也。”<sup>[64]</sup>

曾、左学术风格如此,其它洋务派人士亦大致如是:

张之洞“生长兵间,好阅兵家言及掌

故经济之书”,“尤究心经世之务”,“慨然有经世志”。<sup>[65]</sup>对于经世学风的前导性人物,张之洞也十分敬仰。他称颂王夫之“挥麈谈兵,植槐卜相,雄才张楚国,文章经济一家”;<sup>[66]</sup>赞扬陶澍为道光人才第一;<sup>[67]</sup>称赞魏源是“所谓豪杰之士”。<sup>[68]</sup>其思想情感可见一斑。

郭嵩焘就读岳麓书院期间与曾国藩结成至交,“以著述立言相许”,<sup>[69]</sup>“志终不在温饱”,<sup>[70]</sup>其经世抱负可以想见。王夫之与魏源均是他热烈崇敬的人物。

冯桂芬“喜为经世之学……洋务机要研究亦深”。<sup>[71]</sup>道光十二年(1832年),时为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在苏州考课书院,读到冯桂芬的制举之文,拍案称赞,“有一时无两之誉”。<sup>[72]</sup>其后,林则徐将冯桂芬招入抚署,校林则徐任京职时所撰《北直水利》书稿。冯桂芬自称:“受公知最早,所以期之甚厚。公驰驱绝域,犹手笺酬答无间。”<sup>[73]</sup>可见两人关系深厚。冯桂芬与魏源亦有深交。“桂芬在京时,尝与默深等修楔慈仁寺。在扬州时,尝与默深、刘孟瞻诸子,纵言河事。……默深所撰《海国图志》,桂芬亦草文正其错误,凡四端。”<sup>[74]</sup>

薛福成“稍长,纵览经史,好为经世之学”。<sup>[75]</sup>自称对于“二千年成败兴坏之局,用兵战阵变化曲折之机,旁及天文、阴阳、奇门、卜筮之崖略,九州厄塞山川险要之统纪,靡不切究”。<sup>[76]</sup>

王韬少年时就对八股时文不感兴趣,其致力所在亦为经世之学。“偶遇客谈,辩析毫芒贯穿经史。……凡遇山川厄塞及古今用兵争战之处,辄能言其胜败,了如指掌。”<sup>[77]</sup>

徐寿“应童子试”后便“思(举业)以为无裨实用,弃之”,乃“讲求经世有用之学”,<sup>[78]</sup>“专究乎致知格致之学,潜心经济”。<sup>[79]</sup>

李善兰广采博取西方科学,在科技史上多有精彩成就,其思想动力仍是“经世致

用”。他在《重学》一书的译序中谈《重学》一类西方科技书籍介绍入中国的意义说：

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富强，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曾、李二公有见于线，亟以此付梓，上好之，下必有甚焉。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其功岂浅鲜哉！<sup>[80]</sup>

由此可见，李善兰等科学家所致力的人格致之学，即使是抽象的数学和物理学，亦与这一时期的经世思潮有着密切联系，是这一时期经世实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经世实学在近代的勃兴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来自外部的现代性挑战的积极回应，也是中国本土文化为早期现代化运动提供的动力机制：

第一，经世的基本涵义是经邦治国、经世济民，这一精义推动文化精英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走上御侮自强的防御现代化道路。

第二，经世实学的基本精神是面向实际，崇奉这一价值理念的文化精英因而能从骄傲自大的天朝心态中首先觉醒，觉察到中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反顾赫然，自以为贫且弱也”，<sup>[81]</sup>进而走向变革开放。

第三，经世实学的基本性格是鄙弃空谈心性，注重实功实效，而相当数量的实行人，正是后发国家早期现代化启动和推进的必要条件。清流一派士大夫，“高论唐、虞、商、周糟粕之遗，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独无益，实足贻误事机。”<sup>[82]</sup>其所起作用，正与经世实学相悖。

第四，经世实学既以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为内在精神，其观念和策略就必须随时加以调整，以适应客观的变化。在全球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这种变易观念实际上孕育着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机制

的突破。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的变革实践是最为生动的说明。

第五，经世实学注重学术的务实性与致用性，这一价值取向成为中国人认同西学和汲纳西学的思想基础。如郭嵩焘考察欧洲文化后向国人介绍：“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其政务、学问皆“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辞让之虚文”。“中国乃一以虚骄之大充当之”，“以粉饰为固有之常规”。其差距自然是一日千里。王韬也在《漫游随录》中告诉国人：“英国学问之士，皆有实际，其所学武备、文艺，均可实见诸措施。坐可行者，可以起而行之。”虽然，用中国传统的实学概念来表述西方文化未免不伦不类，但从中可见传统经世实学在中国人认识、理解和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起有一种中介作用。

经世实学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意义是传统文化积极作用于现代化的一个范例。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在整体上成为现代化的原生形态，但其结构中的诸多成分逻辑地构成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基础。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概念，显然不能表述这样一种历史的连续性。

[1] 黄景仁《癸巳除夕偶成》一诗以敏锐的感觉道出了诗人对“乾隆盛世”即将转向中衰的预见。其诗曰：“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2] 《易既济卦·象传》。

[3] 黄彭年《陶楼文钞》、《林文忠公政书序》，癸亥刊本。

[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

[5] [13] 魏源《默觚下·治篇二》。

[6] 魏源《海国图志·序》。

[7] 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是典型一例，王韬为该书作序说：“中丞（指徐继畲）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呜呼！古人著述，大抵为忧患而作。”

[8]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69页。

[9] 李鸿章《复刘仲良中函》，《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

- 卷 16
- [10] 康有为:《槟榔屿督署秋风独坐杂作》,《康有为诗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 年版,第 23 页。
- [11] 《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 年版,第 167-168 页。
- [12] 《孙中山全集》第 卷,第 2 页。
- [14] 康有为:《避地槟榔屿不出,日诵杜诗遣遣》,《康有为诗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 年版,第 23 页。
- [15] 吴樾:《暗杀时代·序》。
- [16]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附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 149 页。
- [17] 《易·系辞下》。
- [18] [20]《易·系辞上》。
- [19] 郑玄在《易赞》及《易论》中阐发“易道”的三层含义说:“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简易”指《易》的文字虽然简约,但却总括了宇宙变化的总规则,“变易”指从宇宙万物到人生永远变化不息;“不易”指变化的规则、秩序不变,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类。
- [21] 龚自珍《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19 页。
- [22] 龚自珍《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5 页。
- [23]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7 页。
- [24] [25] [26]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
- [27] 魏源《书古微》卷十一《周书·顾命篇发微》。
- [28] 《魏源集》(下)第 43 页。
- [29] 冯桂芬《校庐抗议·改科举议》。
- [30]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 [31] 郑观应《易言·论公法》。
- [32] 薛福成《答友人书》,《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 年版,第 94 页。
- [33]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24。
- [34]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
- [35] [38] [68] 张之洞《劝学篇下·变法第七》。
- [36] 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
- [37] 郑观应《盛世危言·凡例》。
- [39]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 年 5 月版,第 21 页。
- [40] 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 年版,第 22 页。
- [41] 《南海先生四上书记》,转见汤志均《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 页。
- [42] 梁启超《论不变之三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第 18 页。
- [43]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 年版,第 21 页。
- [44] 《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18 页。
- [45]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 273-274 页。
- [46]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和康有为撰作的《孔子改经考》是维新派将外来进化论与传统变易思想相结合的典范性作品。
- [47] 《易·序卦传》。
- [48] 《龚定庵全集》,国家整理社出版,第 2 页。
- [49] 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中国史探讨》,中华书局,1981 年版。
- [50]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 25;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 24。
- [51] 魏源《陶文毅公行状》。
- [52]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中华书局 198 年版,第 618 页。
- [53] 《山西献徵·京卿徐松龛先生事略》。
- [54] [55]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 9 卷 8。
- [56] 《曾文正公年谱》,道光十一年。
- [57] 《曾文正公家书》,卷 1。
- [58]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卷 7。
- [59] 《曾文正公手书记》,宣统元年中国图书公司印行,辛亥年七月。
- [60] 罗文钧《左文襄公年谱》卷 1《左宗棠全集》第 2 册,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 1703 页。
- [61] 《与周夫人》(辛丑),《左宗棠家书》。
- [62] 左宗棠《与陶少云》(癸丑),《左宗棠全集》第 1 册,书牋(一),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 1003 页。
- [63] 毛鸿宾《毛尚书奏稿》卷 3。
- [64] 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湘学略》第 3 页。
- [65] 胡均《张文襄公年谱》。
- [66] 张之洞为湘西草堂所题楹联。见《船山学报》,1985 年第 期。
- [67] 《张佩伦日记》,光绪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69] 郑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0 年版,第 1 页。
- [70]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版,第 3 页。
- [71] 李鸿章《覆保冯桂芬片》(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9。
- [72] 《显志堂稿》,卷十二,《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
- [73]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三,《李文忠公祠记》。
- [74]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第 11 页。
- [75] 夏寅官《薛福成传》,《碑传集补》卷 13。
- [76] 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 3。
- [77] 汪韶《天南遁言》,《遁窟谏言》,卷 1。
- [78] 毕世芳《记徐雪村先生轶事》,《碑传集补》卷 43。
- [79] 程培芳《徐雪村先生传》,《碑传集补》卷 43。
- [80] 诸可宝《李善兰传》,《碑传集补》卷 43。
- [81] 邵作舟《纲纪》,《邵氏危言》卷上。
- [82] 《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 198 年版,第 17 页。

(作者为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编辑 束有春】